

毛泽东当我的第一个摄影模特

邵华 口述 建青 华丽 执笔

张文秋和陈振亚结婚那年，毛泽东和这对新人打趣，将来一定要认他们的孩子做干女儿。结果，张家育有两女，毛家育有两子。只是后来做了毛泽东干女儿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俩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们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在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之际，记者有幸采访了毛泽东的儿媳——如今已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长的邵华。

四岁时在监狱里，我对毛泽东有了第一印象

一九三八年初，张文秋与只有一条右腿的第一一五师留守处政治部主任陈振亚结婚，那年秋天，邵华呱呱坠地。

第二年夏天，中央派陈振亚去苏联安装假肢。但飞机在乌鲁木齐加油时，被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扣留。

一九四二年春天，陈振亚从桥上跌入河中，摔成重伤。救治过程中被毒死。不久，一百六十名中共党员被投入监狱。张文秋和两个女儿即刘松林和邵华也在其中。

我们正式被抓到监狱里的时间是一九四三年，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我们还有些小弟弟和小妹妹是在监狱里出生的。可想而知，新疆那么冷，监狱里的生活有多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长辈，也就是那些奶奶阿姨们，就主动承担起了照顾和教育我们这些孩子的责任。没有纸笔怎么办，她们就利用囚犯到院子里放风的机会，拿树棍在地上教我们写字。阿姨首先教我们写的就是“毛主席”这三个字，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的。当大人教育我们的时候，他们就偷偷地把照片展示给我们看，还这样解释：“这是谁？他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我们最热爱的人！”当年我们还看到了一些长着大胡子的爷爷的照片，那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的。可以说，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就是才几岁时在监狱里奠定的。

真正见到毛主席是在四年后的延安，那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们跟爸爸妈妈一块儿排着长队去迎接毛主席，心情特激动。毛主席挨个跟每个人握手，当他和我们小孩握手的时候，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我们觉得毛主席的手比别人的温暖，热



一九六二年春，毛主席与儿媳邵华在中南海。

乎乎的那是一双我们盼望了那么久的手。我觉得不过瘾，就和另外一个年龄大点也顽皮点的孩子商量，要再去和主席握一次手。于是我们飞速跑到队伍的最后，第二次排队。对我来说，领袖毛主席的伟岸形象，并不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他时树立起来的，早在监狱里四年的铁窗生活中，这一形象就在我心目中树立起来了。

我和姐姐刘松林，从干女儿成为毛泽东的儿媳

邵华说自己小时候是刘松林和毛岸英的跟屁虫，她那时常跟着他们往毛泽东家跑，于是就对毛泽东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那时的刘松林和邵华姐妹俩怕是没想到，她们日后会双双成为领袖的儿媳，成为备受关注的毛家人。

我就记得有那么一次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在一块儿，我吃得急了一点，一粒米饭掉到桌子上了。我当时也没在意，还继续夹菜吃我的饭。当时主席坐在我旁边，他一句话没说，拿筷子把那个米粒捡起来，放进自己嘴里吃了。我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难受极了。当时主席其实一句话也没有批评我，只告诉我应该说珍惜粮食，不要浪费。这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从此再没浪

费过哪怕一粒米。我对父亲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他怎样号召全国人民，自己就会首先做到；他怎么样要求青年人，也会首先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在我看来，他不光是领袖，也是我们的慈父、我们的表率！

正因为和毛泽东建立了形同父女般的深刻情感，所以在一九七六年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邵华的眼泪“哗”地一下就流出来了。历史颇具玩味的是，邵华和丈夫毛岸青却是作为叶剑英的亲属参加毛泽东的遗体告别仪式的，邵华说没能在主席最后的时刻见他老人家一面，是她终生的遗憾。

成为我的第一个摄影模特后，毛泽东对我约法三章

毛家有两位摄影艺术家。一位是江青。一位是二儿媳邵华。不过，邵华反例比江青早学摄影十年，而且她当时的身份只是大儿媳刘松林的妹妹，尚未与毛岸青恋爱。不仅如此，江青的早期模特不过是暮色苍茫中的庐山劲松，而邵华的第一位模特却是毛泽东本人。

有一次，我大概是除了一门课得了个四分外，其他的都是五分，成绩不错，便兴高采烈地跑去

向主席报喜。我说：“毛伯伯你看，这是我的期中学习成绩单！”

我以为主席一定会表扬我，谁知他拿过我的成绩单一看，沉思一会儿后对我说：“孩子，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要把精力用在你最喜欢的功课上去。不一定要争取‘满堂红’。”他的话当时对我震动很大，因为那个时候不是讲究要做“三好学生”嘛，而“三好学生”里第一条要求的就是要“学习好”，我心里自然有些不服气，怎么毛主席这么教导我，还不要“满堂红”呢？主席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开导我说：“你要把一门钻透了，把老师教你的东西真正地学到了，比你把精力平均使用开来收获要大。”主席的这番话让我后来琢磨了好一阵，现在想来，确实受用终生。在后来上高中和大学期间，我就是抓住自己最喜欢的课程，几乎把学习精力全部放在语文上了。因此我的作文经常作为范文登在墙报上，也经常在《少年文艺》和儿童杂志上发表，这使我信心倍增，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我最后决定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

我十一二岁时，就已意识到自己和毛主席相处的每一时刻都是非常珍贵的，应该通过某种形式把它永久地保留下来……机会终于来了。我发现了一台岸英哥哥从苏联带回来的老式相机。于是有事没事就缠着哥哥教我怎么操作，等我熟练掌握技术后，就拿这台相机去给毛主席拍照。我的第一个模特就是毛主席。后来，主席见我老爱摆弄着相机给他照相，就给我提了三条要求，而且要我一定做到，否则就不要再给他拍照了。他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所拍的照片都不能拿到外头去冲洗，尽管那个时候全都是黑白胶卷，第二条是绝对不能拿出去发表；第三条是不许将照片送人。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给毛主席拍的标准照我至今珍藏着。值得一提的是，这张照片和当年挂在天安门上的那幅毛主席标准照是同一时期拍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天安门上挂的那张主席像头发是梳得很光的，中山装的领子也扣得很整齐，而我拍的那张像，则是毛主席睡完觉起来之后，头发翘着没有梳，衣领也没扣好，而且一只衣领歪搭在那儿，扣子还没扣好。后来，我曾想过修版，又怕影响原汁原味，最后打消了念头。

（选自《名门之女》

据有关媒体报道，新中国最后一部未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小说《红日》，已拍摄成同名电视连续剧。我不禁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根据《红日》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由瞿白音改编、汤晓丹导演的忠实于小说原作的战争大片，在“文革”中曾被江青一伙诬为“大毒草”。其一大罪名就是所谓张灵甫宁死不降，形象过于光辉，在国共双方形象大比拼的时候，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为此，在一九六六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冬天，小说作者吴强首当其冲地遭到运动的冲击，被迫靠边劳动、隔离审查、投入监牢长达十年之久。

那么，吴强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又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小说呢？

吴强是解放战争的亲历者。他原名汪大同，江苏涟水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投笔从戎，在皖南泾县云岭村参加新四军，次年十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干事、科长，苏中第二分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一面用手中的枪对敌英勇作战，同时用手中的笔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火热生活，写下了独幕剧《一条战线》、《激变》、《皖南一家》等十多部作品，创作了《叶家集》、《小马渡军》等中短篇小说。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苏中军区政治部副部长，华东野战军六纵宣教部部长，亲历了第二次涟水战役与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七日，即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的第二天上午，吴强在驻地的村口，亲眼目睹了张灵甫这位梦想“立马沂蒙第一峰”的“天之骄子”“常胜将军”，最终躺在一块门板上被解放军战士从山上抬下来的情景，由此，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把从涟水战役到张灵甫死于孟良崮这个“情节和人物都很贯穿的故事”编织起来写一部长篇小说！

然而，部队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静不下心来写作。但他心里总是想写，好像有一种魔力在激励着他，走也想，坐也思，就连梦中也在思考着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搅得他神魂颠倒，如痴如狂。新中国成立后，吴强任华东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一九五二年转业到地方，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部长、中宣部文化部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中共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委员。经过长期的艺术构思，他终于带着八万字的《红日》故事梗概和一大皮箱资料躲进南京军区招待所一间僻静的房间，开始构筑这项浩大的工程。

他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抽两三包烟，不完成六千字的任务不上床。直抽得口舌发麻，吃饭味同嚼蜡，胸中隐隐作痛。虽说住在招待所，却常常错过开饭时间，一天吃一顿饭是常有的事。他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欢愉之中。这样废寝忘食地写作，对他的身体摧残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他两鬓生了许多白发，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连走路也力不从心。有一次晚饭后上街散步，竟撞在一棵树上，还向那棵树连声致歉，引得行人驻足哄笑，以为他神经错乱。初稿完成的当天，他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丝力气，只得住进了医院输液。半个月之后，身体稍稍复元，他又提着皮箱来到了杭州的一个部队招待所写第二稿。这道工序并不轻松，需要重新遣词造句，工整抄写，整整持续了四个月，才算圆满地画上了句号。而此时，他的体重已由七十四公斤下降至五十八公斤，几近虚脱。

吴强在南京写作时，南京军区第三政委、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和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纪成不时抽身到他的住所看望，经常给予他勉励和关照。因此，《红日》写成之后，他首先将小说打印稿送给王必成审阅。王必成看后，心里认为小说动人，但是他却说要江政委拍板敲定。未料江渭清一看书稿，又喜又气，把吴强好好熊了一顿。他说：“中国革命战争，每一个胜利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胜利。我们这个部队的光荣战绩，是刘伯承、邓小平、陈老总 and 粟裕指挥得力嘛，成绩怎么能记到六纵队身上？当然人物是虚构的，但番号是真实的。读者一看六纵的司令和政委，就自然误会我和王必成同志了。我认为我不能贪功，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就是为人民服务。文学作品当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写工农兵，然吴强一点也没有错。但话又说回来，六纵是真实的，那么司令

和政委也是帽子底下有人啊！反正我解决不了这个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只知道，我们的一切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吴强被江渭清熊得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抽烟。这是因为，当年江渭清是他的顶头上司，又是战友，情谊深厚。他寻思，孟良崮战役是六纵打的，小说中不提六纵是不可能的。尽管主要的反面人物张灵甫用了真名，但六纵的主官却用了化名，他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至于这样来处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矛盾究竟行不行，反正最后要送总政文化部审定后才能出版，干脆就把矛盾上交吧！应该说，江渭清是富有政治斗争

《红日》是这样喷薄而出的

石湾



经验的，果不出所料，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年代，他简直就成了“炮制”《红日》的“罪魁祸首”。许许多多的大块文章骂《红日》是为他和王必成树碑立传，批《红日》宣扬战争恐怖，是一部反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大毒草。这是后话。

《红日》的送审和出版确实遇到了麻烦。吴强先是将小说打印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等了很长时间，杳无音讯。他不得已亲自来京，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稿子要了回来，直接送到总政文化部“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室，交给了出版编审处处长马寒冰。又等了半年，仍无人与他联系。无奈之下，他只得向老战友沈君默求助，设法与中国青年出版社接洽。沈君默是《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渡江侦察记》的电影文学剧本就是由中青社出版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印了几次，发行达六七十万册，深受读者喜爱。一九五七年五月，沈君默在一个星期天找到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家，表示了他的新作《海魂》仍愿交由中青社出版，同时向他讲述了吴强长篇小说稿的遭遇，说：“我知道你们只看作品，不管作者有名无名。把他的《红日》送给你们出版好吗？”江晓天笑笑回答：“马寒冰我熟，我给你打个电话，催催他叫‘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的同志快看，如稿子行，就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由我们中青社出版。”沈君默说：“还是由我把稿子拿出来给你，你们看得快，作者已经委托我代办。”第二天，他就抱着大包稿子跑到

江晓天家来了。当时，江晓天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抽出一天半的时间将四十万字的稿子浏览了一遍。因他原本也是新四军，虽未亲历《红日》中所写的三次战役，但这三次战役的胜利和挫折，都曾牵动过他的心，所以，他越读越受感染，心里充满愉悦和兴奋之情。同时，他被作品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从宏伟、激烈的战争场面中，几乎嗅到了昔日的炮火硝烟味，备感亲切。最令他敬佩的是，吴强笔下众多的人物形象，大都各具个性特色，鲜明生动。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如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形象刻画，不是简单化的漫画式勾勒，而是敢于写他的顽强、狡诈和凶狠，敢于挖掘他的内心世界。江晓天觉得，这正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从而体现出我军胜利的来之不易，有力地讴歌了我军将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此外，小说还用相当的篇幅写了我军高级干部的爱情。自新中国成立初期错误地批判了碧野的长篇小说《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之后，军事题材作品几乎再也看不到爱情生活的描写了。由此，江晓天感到，《红日》是一部有重大突破的军事题材作品，看完稿子的当天晚上，他就把它作为向建军三十周年献礼的重点书稿交给了编委会副主任陶国鉴。他之所以选择陶国鉴来当《红日》的责任编辑，是因为陶国鉴也曾是新四军，既熟悉这段历史，也怀有深情。

陶国鉴是个长于做案头工作且非常仔细认真的老编辑，一个月后，他向江晓天汇报，吴强的《红日》确实写得很好，文字技巧也无须作多少加工，稿子已安排有了。不过，石东根连长这个人物，有些描写可能会在社会上引起争议，看是否需要作一些删改？江晓天知道，他指的是吐丝口战斗中一个连出了两个英雄班，活捉千余名俘虏，连长石东根在欢庆餐时酒喝多了，高兴之下，穿上缴获敌军的将官服、大皮靴。挎上指挥刀，骑上大马到野外奔驰的情节。江晓天想了想回答：“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不过军长已批评了他，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

尽管稿子不必作大的修改，但距离八一建军节只有一个多月了，为了争取时间，陶国鉴经与校对、美术设计、印刷装订、发行、宣传等业务部门紧急协商，制定了一个保证“八一”出书的工作日程表，并把中青社为《红日》的出版一路大开绿灯的情况及时写信告诉了吴强。吴强高兴地回信说：“你们对这部东西，采取热情的态度，紧急的步骤，我很满意，大样来不及，我就不看了。”一部书稿的大样在北京与上海之间来回邮寄，当时确实麻烦又误时，但对不再看大样，吴强心里又不太放心。因此，就在文学编辑室紧张地看校样之时，吴强又连续来了六封信，每封信都提出一二处小的改动。吴强很动情地在信中写道：“现在可能发了稿，在书未和读者见面之前，心总是不安的，因为一大批将近四十万字的书，在经济上要花好多万元的本钱，你们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也很大，倘使保存许多毛病在书里，是很危险的。哪怕是个别字句不妥，也会引起这种难过，除非是作者自己为精力所限而确实无法补救的，为此，还得麻烦你们一下……”为使吴强放心，陶国鉴以文学编辑室的名义立即回信告诉他：“历次修改的地方，均已一一照改，此点望您释念。至于校对是否仔细，我们感到已尽力了，当有待您看过样书后评价。全书未能请您看校样，我们有与您同样不安心情，所以希望您看到样书后，立即提供一个校正本，以便再版时纠正。”同时在信中告诉吴强，“《红日》第一次印刷为四万五千册，第二次印刷一万六千册，两次印刷相距甚近”。由于文学编辑室与有关业务部门密切配合，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红日》终于以惊人的速度在七月二十日提前出版了！

《红日》的喷薄而出，震撼了中国文坛。评论界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正面展现我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七十四师的宏伟画面，激烈、壮丽，洋溢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热情。反映了我军由弱到强，最终取得辉煌战绩的历史进程，体现了人民战争规律，形象地揭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在敌我双方人物，尤其是高级将领典型性格的刻画上，有很大的突破性成就，对于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九五三年，正当朝鲜停战谈判将要达成协议之际，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蓄意破坏停战遣返协议，疯狂叫嚷要“单独干”“向北进”“一定要实现统一的目标”等等。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促进停战谈判，争取对我方有利态势，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在金城以南地区发起夏季反击战役。

我68军203师正面之敌李承晚军首都师第1团，是李承晚的精锐部队之一，曾被授予“白虎团”称号，其团旗及各种车辆上都印有白虎图像。该团占领金城以西、上甘岭以东的突出部防线后，已构筑了坑道、盖沟、环形战壕和各种明暗火力发射点相结合的半永久性坚固防御阵地。此外，还直接得到美军五个榴弹炮营和大量坦克、航空兵的支援。敌人吹嘘这是一条“坚不可摧”的防线。

战前我们拟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我是203师作战科的副科长，参与了这次组织指挥的全过程。为了摸透敌情，以便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师、团不仅组织专业侦察人员深入敌人阵地进行特定侦察，还组织部队战斗组长以上人员现地侦察，营、连、排干部

奇袭“白虎团”始末

康海

对各自选目标进行摸察，师、团干部也对主攻方向的要点进行勘察。在部队占领进攻出发阵地的第四天，我们以伏击手段成功地歼灭了“白虎团”的搜索队，捕获五名俘虏。经过讯问，进一步查明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这样，就为我方定下全歼敌人的决心奠定了基础。

“白虎团”防御阵地正面达3.5公里。总的兵力对比，我方三倍于敌。但敌火力优于我方，而且敌阵地是绵亘的防御体系，没有暴露的翼侧。师首长认为，敌左翼阵地虽是弱点，但不是要害，突破后对敌整个防线威胁不大。右翼阵地是敌人的强点，也是它的致命要害，于是决定集中主要兵力火力于敌右翼进行突破，打开口子后，沿山谷直插敌之侧，不等第一梯队占领高地即对敌主阵地进行攻击。这样，使敌首尾不能相顾，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一鼓作气将其整个防御部署打乱。由于“白虎团”防御阵地没有暴露翼侧，我军采取了穿插战术，在突破敌阵地的同时，由步兵第609团副团长赵仁虎指挥其第2营及由第607团侦察排组成精悍的化装袭击班，化装成李承晚军，在

穿插营先头行进，进行穿插作战，直奔二青洞，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手段，首先消灭敌“白虎团”指挥所。

我们把穿插点选在第一梯队突破的前沿阵地直木洞南山顶部东侧。选择这个位置避开了敌人谷底密集的障碍物和炮火封锁区；利用了第一梯队的突破成果；利用我火力对敌主峰进行猛烈压制，敌人无暇顾及接合部，来不及用火封锁415鞍部之时机，有效地保障了穿插分队第2营和“化装班”得以顺利突破敌415鞍部的防御阵地，迅速插入敌之纵深。行进在第2营先头的“化装班”在穿插过程中，曾几次与相向行进的小股敌人遭遇。为了完成消灭“白虎团”指挥所和纵深内敌炮兵的总任务，他们巧妙地让过敌人，以最快的速度插到敌团指挥所附近。这时，他们又突然遭遇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不给予在敌团指挥所沟口集结的这股增援部队以袭击，不仅会影响歼灭敌团指挥所，还会使敌人有从容的时间对付我穿插分队。在这种情况下，率领我“化装班”的副排长杨育才同志当机立断，指挥全班给增援之敌以突然有力的打击，并乘敌人混乱之际，以神速的动作冲进敌团指挥所——二青洞。此时，敌人正在开会，我“化装班”一阵猛打，当场将“白虎团”团长和机甲团团长击毙，余敌大部被歼。我穿插营闻枪声后，立即插到敌增援部队两侧以及敌炮兵阵

地中间，将敌援兵和炮兵全部消灭，随即建立阻击阵地，阻敌逃跑和反扑，为保障师主力全歼“白虎团”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第607团第一营的一个排，由于攻击迅速勇猛，与上级失去联系，但他们没有消极等待，而是向战斗最激烈的421.2高地前进，恰好冲到正向穿插第2营展开反冲击的敌人背后，战士们立即协同第2营歼灭了反冲击之敌，排除了敌人对421.2高地西侧的威胁，使607团1营和609团2营的阻击阵地形成一个整体，有力地保障了高地的固守和正面进行部队对钻进坑道、盖沟内之残敌的肃清，从而取得了全歼“白虎团”战斗的胜利。

此战从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开始，十四日八时结束，全歼敌“白虎团”及敌机甲团两个营、美军第555炮兵营等，俘敌八百四十余人，毙伤敌三千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2门，坦克13辆，汽车137辆，轻武器1256（挺）支，攻占敌阵地27平方公里。此战其战法之奇，伤亡之小，战果之大，在中外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康海 1928年10月生，河北深州市人。作为志愿军203师作战科副科长，参加了奇袭“白虎团”作战组织指挥的全过程。归国后曾任军事科学院战术研究员、军副参谋长、山东省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选自《震撼世界一千天——志愿军将士朝鲜战场实录》）